

论库切《耻》中叙事的不稳定性

丁小月^{1,2}

(1.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2.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 修辞叙事理论在批评界影响深远, 而叙事进程理论作为修辞叙事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核心概念之一文本动力主要体现为不稳定性叙事。不稳定性叙事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以《耻》为例, 从文本动力的视角具体分析不稳定性叙事是一种新的批评尝试。研究发现, 小说中库切主要通过几组不稳定因素的发展和解决使得叙事进程一步步向前推进, 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 叙事进程; 文本动力; 不稳定性; 《耻》

中图分类号: I470.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0358(2023)3-0030-04

0 引言

自古以来, 叙事就是一门艺术。而叙事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在法国诞生以来, 其发展十分迅猛, 早已越出法国国界并激发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下的文学研究领域, 叙事理论的研究“已经取代小说理论成为文学研究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1]15}, “正在占据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2]300}。修辞叙事理论作为当下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也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谈及修辞叙事学, 不得不提詹姆斯·费伦, 他是美国著名的《叙事》杂志主编, 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的英文系教授, 也是当今国际学界公认的修辞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 其首创的叙事进程理论为文学作品的叙事解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1 叙事进程理论及文本动力

叙事进程为费伦提出的一个叙事学专用术语, 它脱胎于传统小说理论的“情节”一词。费伦于 1989 年在其专著《阅读人物、阅读情节: 人物、进程与叙事阐释》中首次提出“进程”这一概念, 认为“进程作为一个术语, 指一种动态叙事, 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在讲述和接受两个层面上的运动”^{[3]15}。这是费伦关于叙事进程的最早定义。此后, 在《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一书中, 费伦从宏观层面, 即故事和话语的层面进一步对“进程”做出阐释, 认为叙事进程实质上表现为两种动力系统的共同作用, 具体来说, 进程指的是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因此指叙事作为动态经验的第一个意思), 而且指这一运动邀请读者做出的各种不同反应(因此也指叙事作为动态经验的第二个意思)。结构主义就故事和话语所做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叙事运动的逻辑得以展开的方式。进程可以通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产生, 即通过引入不稳定因素(instabilities)——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 它们导致行动的纠葛, 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进程也可以由话语中的因素产生, 即通过紧张因素(tensions)或者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重要分歧的关系。^{[4]253-254}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费伦认为进程是一种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富有动态性特征的叙事运动, 它产生于故事层面上的不稳定因素(人物、事件的冲突)和话语层面上的紧张因素, 即作者与读者或者叙述者与读者在知识、信仰或价值方面的分歧。费伦的这一定义既凸显了文本因素的重要性, 也强调了读者阐释因素的重要性。可以说, 叙事进程展现了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的合力运作。在著作《作为修辞的叙事》中, 费伦

收稿日期: 2023-06-12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SJA1816)

作者简介: 丁小月(1978—), 女, 江苏如东人,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认为叙事进程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通过不稳定性,即人物和环境之间存在的不稳定关系;二是通过张力,即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在信仰、价值、知识、见解、判断上的分歧。^[45]也就是说,叙事进程包含了故事层面的文本进程和话语层面的读者阅读进程,费伦把这两种进程中的动力明确为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本文侧重从文本动力的角度来探讨具体作品的叙事特色。作为文本内部运动的逻辑方式,文本动力体现为故事内部的不稳定环境。费伦认为,不稳定性“可能产生于人物之间;人物与他的世界之间;或在一个人物之内”^[47]。这三种不稳定性的实质是一种矛盾冲突,它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得叙事不断向前推进。

2 《耻》中的不稳定性叙事

南非著名作家库切的作品《耻》发表于1999年,堪称是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民众和殖民者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的有力作品。小说描写的是南非白人教授卢里因为与女学生的丑闻曝光而辞职,打定主意到女儿露西的农场生活,然而却时常因为无法与女儿良好地沟通而受到困扰。在这部小说中,库切通过几组不稳定因素的发展和解决使得故事一步步向前推进。

2.1 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第一组不稳定因素来自于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它贯穿于小说的起始、中段和结尾部分,可以看作是小说叙事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在小说起始部分,卢里作为开普技术大学传媒学副教授,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有一个女儿,但却过着并不体面的情感生活。然而,这种生活的平静却很快被打破。某天,卢里在街上偶遇了前面人群中的索拉雅和她的两个孩子,并违背诺言悄悄跟踪,直到他们走进餐馆。但卢里并没有停步,他走过餐馆又回转身,再一次从餐馆前走过,并与餐馆玻璃窗后索拉雅的目光相遇,但这种目光对视让他立刻后悔不迭。尽管再见面时谁也没有提及此事,但两人都为此觉得很不自在,谁也无法把已发生的事情搁置一边,两人之间也渐渐生出一股冷淡。实际上,卢里已经搅乱了对索拉雅而言极不稳定的双重生活。不久,索拉雅以母亲生病需要照料为由离开卢里,两人一年多的稳定情感关系被打破。但卢里并没有就此罢手,他雇请侦探跟踪索拉雅,还冒昧地打电话到她家期待能再次见面,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卢里失去了索拉雅。可以说,卢里和索拉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小说叙事中的首个存在于人物卢里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对立,它反映了卢里的个人生活存在个人生存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随着小说叙事的发展,卢里和他学生梅拉妮的丑闻被揭发,于是他毅然决定辞职来到女儿露西的农场。在农场,卢里和黑人雇工佩特鲁斯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展现了人物卢里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第二种对立关系。从白人入侵非洲对黑人进行殖民奴役起,白人和黑人之间就充满对立和冲突,这种存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稳定因素正是小说的主体所在,也构成了叙事中最基本的不稳定要素。卢里和佩特鲁斯第一次见面时就表达出对女儿孤身居住于偏僻农庄的担忧和不安,那是一个被黑人所包围的环境,卢里父女是仅有的白人。佩特鲁斯同样认为农场生活是有点危险,但停了停又说:“可现在哪儿都危险。可我看,这里倒还平安无事。”^[57]显然,白人作为越界入侵者,与当地黑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白人是被孤立的群体,感觉危机四伏。就在卢里逐步努力适应农场生活,适应乡下生活的节奏时,毫无征兆的考验来了。某日,三个黑人(其中一个孩子)借口要打电话进入露西家,他们疯狂地实施了抢劫,还打伤、烧伤卢里,并把他囚禁到卫生间。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对于白人群体而言是“个人之耻”也是“历史之耻”。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那男人嘴一咧,说了句什么话。接着又是一阵大笑。过了一会儿,那男孩也走过来,两人站在窗下,边审视着被他们囚在屋里的人,边讨论着如何处置他。他(卢里,笔者注)会说意大利语,他会说西班牙语,可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到了非洲的这个地方,哪一个都救不了他。”^[5107]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里虽然满腹才华,精通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但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却什么语言都派不上用场,而当地的土语才是真正有权势、有力量的语言。这似乎也是殖民主义在非洲殖民地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为殖民者入侵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有历史意味的反讽。在叙事的中段部分,为追查施害者,卢里对佩特鲁斯展开了一系列追问,但佩特鲁斯却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卢里十分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卢里和佩特鲁斯之间的对立冲突进一步凸显。

随着叙事的推进,卢里和露西在佩特鲁斯家的派对上认出了嫌疑人。卢里强烈要求打电话叫警察,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反应,但佩特鲁斯却无视他的两次请求,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而在是否应该报警的问题上,卢里和女儿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父女之间的这种矛盾又形成了小说叙事中人物卢里与其他

人物之间的第三种对立关系。在卢里离开派对回到家,刚拿起电话准备报警时,露西就前来阻止:“戴维,别打,千万别打。这不是佩特鲁斯的错。要是你叫警察,他的晚会就毁了。别不讲道理。”^[5149]卢里吃惊至极。露西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我自己的生活。要生活在这里的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一个人的事,与你无关……至于佩特鲁斯,他并不是我的雇工,并不是只要我以为他和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就可以辞了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啦,都随风而去啦……”^[5149]卢里和女儿处理事件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向读者暗示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南非存在针对白人和黑人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出现了道德相对主义,即使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也无法战胜殖民地的价值标准,而露西正是为了逃避不同价值标准的评判,选择了将这件事当成个人私事,拒绝报警。也可以这样认为,露西实际上已成为殖民主义的替罪羔羊,她的遭遇和耻辱是殖民主义入侵非洲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结尾部分,卢里也重新回到了女儿居住的乡下,一边在贝芙·肖的动物诊所里打杂,一边准备迎接露西和佩特鲁斯的第一个孩子,这个结局昭示着存在于父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得以解决,也表明入侵非洲殖民地的西方文明已被彻底消解。总之,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文本中的不稳定关系,它随着叙事进程的逐步发展最终都得以解决,在这些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小说叙事得以顺利推进。

2.2 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对立

小说中第二组不稳定关系来源于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白人与其所身处的世界间的不协调体现为两方面:白人与非洲自然环境间的不稳定性和白人与非洲社会环境间的不稳定性。作为来自城市开普敦的大学教授,卢里初到女儿的乡下农场,面临种种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半夜里,他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其中有一条狗特别地叫个没完,就是不肯住口,其他的狗跟着叫起来,叫着叫着,它们的声音低下去了,可又不甘认输,又叫了起来。”^[5175]这就是露西愿意长久立足谋生的地方,它远离城市的富足,是一片充满艰辛、危险的贫瘠土壤。在卢里眼里,“颇有凉意的冬日,太阳已经颠颠地落在红土山尖,山坡上稀稀拉拉地散布着开始枯黄的草。他暗想到,多贫瘠的大地,多贫瘠的土壤。地力给耗尽了”^[5172]。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生存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更何况这是一个黑人统治的地盘,白人在这里是被黑人社会所孤立的群体,白人与黑人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和冲突。而作为白人对外扩张载体的语言“英语”也失去了自身的功能,在生活中毫无用处。例如,当卢里观看电视上的足球转播赛时,“评论员一会儿用索托语,一会儿用科萨语,两种语言他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把音量调得尽可能地低”^[5184]。结果看着看着就打起了瞌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卢里醒来时,“佩特鲁斯坐在他身边,手里拿着啤酒瓶。他已经把音量调高了些”^[5184]。佩特鲁斯很享受看球赛的过程,又是喊叫又是拍脑门,看完足球赛又看拳击赛,不亦乐乎。不难看出,英语在非洲处于“失语”的境地,一无用处,正如白人群体在非洲毫无话语权一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孤立而无助。白人与非洲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种种对立越来越尖锐,这种鲜明的不稳定性为后来卢里父女受到黑人的入侵事件打下伏笔,推动了叙事的进展。

2.3 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小说中第三组不稳定关系来自于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在小说起始部分有一段对卢里性情的描述。“他的性情已经定了型,改不了了。首先是那一头脑壳,其次就是这一腔性情,这是人身上最顽固的两个部分。”^[5192]这就是卢里,一个五十二岁白人教授的真性情。当他与学生梅拉妮的丑闻被曝光后,校方出于保护卢里教职的考虑给予他公开悔过的机会,但却被卢里果断拒绝,他只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却不愿意悔过,坚信“这样的承认应当足够了。说什么也谈不上悔过的事。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种言语范围”^[5164]。这儿不难看出卢里作为白人教授的骄傲与自尊,他的心高气傲使他毅然决定辞职到女儿偏僻的农庄生活一段日子。然而,卢里的所有骄傲和自尊在农庄的现实生活面前被击得粉碎,他经历了一系列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生活。小说中最能体现卢里这种内心冲突和性情改变的是黑人入侵事件。当比尔·肖把卢里从医院接到自己家,卢里半夜醒来被露西喊救命的幻象所震惊,他感觉得需要和女儿谈谈,但遭到拒绝。卢里深深地感到虚弱和心情晦暗。“他平生第一次有了老之将至的感觉:没有一点力气,没有一丝希望,没有任何欲望,未来会发生什么,听之任之。”^[5120]卢里感受到了绝望和无助。即使警察来了,露西也只是轻描淡写,像背书似地介绍了案件经过。到了晚间,当卢里想旧话重提的时候,露西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使他心里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后来,卢里又试图和佩特鲁斯谈论案件一事,但佩特鲁斯就是不肯说出卢里想听的那些话,一句简单的“不,你没有错”就把卢里打发了。卢里的内心经历了一阵狂风暴雨的袭击:“一股怒气涌过他全身,其强烈程度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抄起铲子,将一铲淤泥水草高高地掀过头顶,掀出池子。你这是在大光其火了,他暗暗责备自己:快停下!可眼下,他恨不能冲上去掐住佩特鲁斯的脖子。他真想对佩特鲁斯说:要是事情不是发生在我女儿而是你老婆身上,你就没那份心思抽烟枪,没那份心思说话时把每个字都仔细掂量掂量了。”^{[5]134}

然而,佩特鲁斯始终惜字如金。卢里尽管内心盛怒也拿他毫无办法,最终只能忍气吞声一言不发地和他一起把农场活儿干完。不难看出,卢里作为白人的那份自尊和骄傲正在被逐步地消解。后来卢里知道了露西怀孕的事情,也知道女儿将要嫁给佩特鲁斯,他感到很震惊,不愿接受露西对黑人的妥协,感到这是一种耻辱、一件丢脸的事。然而,小说最后,卢里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心的情感冲突之后,仍然决定待在女儿身边照顾她,陪伴她迎接即将出世的婴儿。可见,卢里最终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妥协,放下作为白人的自尊,努力地融入当地的黑人社会,这也正是种族隔离制废除后的南非白人群体真实生活的写照。至此,存在于卢里内心的各种矛盾也得以解决,小说的叙事进程最终走向圆满结局。

3 结束语

运用费伦的叙事进程理论可以深入分析库切小说《耻》中叙事的诸种不稳定性。分析表明,库切正是通过构建小说中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对立、人物与环境之间以及人物内心的诸种对立冲突来展现作品中存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而这些不稳定性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是文本动力的集中体现,它们关系着整个叙事的走向,也合力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充分理解《耻》叙事进程中的不稳定性,为我们解读库切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MARTIN W.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PHELAN J. Reading Narrative: Form, Ethics, Ideology[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PHELAN J.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4]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 J M 库切.耻[M].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范可旭)

On Narrative Instabilities in Coetzee's *Disgrace*

DING Xiao-yue^{1,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criticism community, and theory of narrative processio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and one of its core concepts, textual dynamics, is mainly embodied in unstable narratives. Narrative instabilities drive the narrative procession of the work. Taking the *Disgrace* as an exampl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dynamics, narratives instabilities, as a new critical attempt, are specifically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novel, Coetzee mainly makes the narrative procession move forward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resolution of several groups of unstable factors,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his brilliant narrative art.

Key words: narrative procession; textual dynamics; instability; *Disgrace*